一、“一个幻想的太阳”

中华民族引进异国文化，有过一系列历史创举。对佛教的的吸收容摄、改铸重塑，曾经是轰轰烈烈，历时长久。这些虽然是陈旧又陈旧的历史往事，其中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却不少。

从两汉之际到唐宋，域外佛教的持续输入高潮迭起。外籍和汉族僧侣或东来传教，或西去求法，在传播佛教的同时，也增进了各国问的文化交流，加深了各族间的相互理解，建立了彼此珍视的友谊。他们的活动直接开阔了人类的文化视野，激发起超出宗教范围的创造智慧。

当佛教进入中原大地时，它在域外已经成长发育了约 500 年，是一种成熟丰满的宗教形态，自然带有浓重的异国情调。经过中国社会的长期熏染陶冶，佛教文化与汉文化从冲突碰撞到协调融合，形成了它适应中国社会的独特外貌和内在精神，具有旺盛顽强的生命力，并且彻头彻尾地浸透到汉文化的各个层面。

佛教义学恢宏博杂，曾长期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有影响的思潮，并且代表过某些时代抽象思维所能达到的水平。佛教学僧创用的一系列名词、概念、命题及其思辨方式，颇有活力地运行于中国古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代思想界。从玄学到理学，从道家哲学到儒家哲学，受佛教的浸润程度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加重。中国的所谓儒、释、道三种教化体系，实际上处于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混融状态。到了近代，某些进步的思想家仍然埋头发掘古老的佛教义学，寻觅构造新哲学的材料。

中国佛教的典籍汗牛充栋，既有出自著名翻译家之手的大量汉文译籍，又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僧俗的撰述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佛典并非只是在僧侣的案头摊开，而是普遍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。在浩如烟海的各类佛教典籍中，不仅有教化世人的佛言祖语、荒诞神话，更有古人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实录，内容广泛，包罗万象。这些典籍实际上具有佛教遗产和世界文化珍品的双重价值，是具有不可取代性的、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古代文化宝藏。

在封建社会历史上，佛教曾对缓和社会冲突发挥过重要作用。阶级压迫、民族压迫、战争破坏以及各种天灾人祸，往往使农民失掉原来的生产和生活场所。他们被社会抛弃后无奈流入佛门，在那里找到重新生活的天地。禅宗的形成和发展，更使中国佛教这种特殊的社会缓冲作用表现得极为充分。从隋唐初期开始，避世求生的禅僧群体垦荒开田，自耕自食，农禅并举，为南北朝以来就存在的流民逃僧提供了生活基地和精神家园。

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实践，往往使佛教理论

发生根本改观。

印度佛教原有一套严整细密的戒律系统，这是异国的宗教伦理体系。它的核心内容直接与儒家伦理观念相抵触，形成水火之势。在不断的交锋中，佛教侧重向儒家的纲常名教倾斜，使其伦理观念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。佛教僧侣虽然长久地保持着超然世外的姿态，却逐渐坚定了协契皇极、维护纲常名教的立场。佛教的佛、菩萨和善神也逐渐具备了劝忠劝孝的功能。佛教倡导的由善恶果报引起生死轮回的说教，在中国社会影响深广，但是判定善恶的标准，不容置辩地建立在儒家纲常名教的基础之上。纲常名教实际上成了作为中国宗教都必须具备的宗教伦理脊骨，佛教自然也不例外。至于宋代及其以后僧侣所表现出的更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，则进一步淡化了佛教的异族色彩。

佛教推出的佛、菩萨和诸神，曾慰藉过苦难世界中的受伤心灵；它描绘的极乐世界情景，曾引起芸芸众生的虔诚向往；它传授的求助诸神祐护、达到个人解脱的种种操作方法，曾使许多人不顾一切去模仿修习。建寺造塔、开凿石窟、写经塑像，名目繁多的功德佛事曾蔚成风气，至今还留存数不胜数的珍贵古典艺术品。当人们对自我丧失信心时，很可能去抬高佛神的价值，赋予诸神以无边神通和无限能力，然后又拜倒在自己塑造的神灵脚下祈求恩赐。但是，不堪忍受世俗压迫的人们也会借用佛教作为造反起义的旗号，鼓励人们为创造美好人间

而战。生死轮回、菩萨祐护、诸佛实在，这一切对激发造反者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，都曾起过程度不同的作用。脱胎于正统佛教的一些民间秘密宗教团体，也利用佛教的某些信仰来团结信徒，增强凝聚力。

在中国佛教的演变进程中，既有过辉煌的鼎盛阶段，也有过衰败的“末法”时期（指佛法将灭的佛教用语）。封建帝王的政治需要，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态度，底层民众的现实追求，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佛教的起伏波动和转型变态。

“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，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，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”（马克思：《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〉导言》）。佛教也是一个幻想的太阳，在时而炫目、时而黯淡的佛光中，有人的世俗业绩、世俗生活、世俗追求和世俗情感。谨呈读者的这本小册子，自然无能对内容广泛的中国佛教进行深入分析或系统论述，只想勾勒出这个幻想的太阳长久旋转的大体轨迹。对于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佛教的笔者来说，这已经是不小的奢望了。

二、佛教初传与早期形态

1. 域外佛教一瞥

公元前 6 至 5 世纪，印度恒河流域地区诸国争霸，思想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“百家争鸣”局面。相继涌现的诸派沙门领袖竞立新说，逐渐汇聚成多层次冲击婆罗门教神学体系的时代思潮。佛教作为沙门运动中的一派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。

根据晚出的传说，佛教创始人名悉达多，姓乔达摩，出身于刹帝利种姓，是迦毗罗卫国（今印度、尼泊尔接壤处）净饭王的太子。乔达摩（约公元前 566～前 486 年）自幼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，29 岁时，因有感于人生的痛苦，出家访道，寻求解脱，成为沙门运动中的一员。35 岁时，他通过独立思考，完成了以“四谛”（四真理）为框架的教义体系，此后便在恒河流域一带从事收徒传教活动，历时 45 年。信徒往往尊称乔达摩为释迦牟尼，意为“释迦族的贤人”。最通用的“佛”或“佛陀”称号，是“觉悟者”的意思。

约公元前 4 世纪，佛教僧团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分裂，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。在此后的约 500 年间，从这两个系统中相继独立出二三十个派别，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般称“十八部派”。传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（公元前 269～前 236 年）积极扶植佛教，支持编集佛教典籍，派遣高僧四处传法，使佛教开始从地区宗教向世界宗教过渡。佛教的势力西达地中海东岸诸国，北到克什米尔、白沙瓦，南进斯里兰卡。在不间断的传播过程中，佛教分为南北两条延伸路线：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向东南亚流传的，称为南传佛教；以克什米尔、白沙瓦为基地，向大月氏、康居、大夏、安息以及我国新疆地区流传的，称为北传佛教。我国汉地佛教以北传为主，兼有南传的一些影响。

约公元前 11 世纪，随着佛教广泛流行，在家信徒成为推动佛教变革的强劲社会力量。在印度南方的案达罗王朝、北方的贵霜王朝、恒河平原的吠舍离等地，涌现诸多新经典，兴起佛教新思潮，称为“大乘佛教”。公元前后，大乘佛教开始流传到印度全境，并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。与此前的佛教诸派别相比，大乘佛教的个性特征十分突出：它把深入社会和拯救众生作为自我解脱的前提，不再以个人解脱为主要修行目的；它强化对佛的崇拜、编造佛的神话、扩大成佛的范围，突破了僧侣或在家信徒不能成佛的传统观念；它继承了四谛、十二因缘、业报轮回等旧教义和许多具体戒律，注重从理论上重新诠释和发挥，从而使佛学的思辨色彩更浓厚，使佛教的抽象思维水平产生了飞跃；它吸收外道（佛教以外的宗教或哲学派别）思想，容纳民间

巫术，使佛教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。大乘佛教把此前的佛教诸派贬称为“小乘佛教”，以显示自己的更优越、更神圣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大乘和小乘并行发展和传播，其间也时常发生教义上的论辩和宗派上的明争暗斗。

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，逐步形成了中观和瑜伽行（唯识）两个经院气十足的教派，两派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。两派的教理虽有差别，但都沿着思辨的路子向前走，烦琐学风日盛一日，逐渐成了极少数知识僧侣的专利，流行在几个重要寺院中，与社会民众越来越隔离。佛教发展的最后趋向，是持续吸收各地民间信仰，接纳咒语巫术之类，使大乘佛教密教化。7世纪产生的密教，在宗教精神上与印度教协调一致。由此开始，恰值我国的隋唐时代，印度佛教呈现出衰落之势，中国佛教进入昌盛阶段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地，一方面持续输入域外佛教因素，一方面以佛教输出为桥梁，向相邻国家和地区传播多姿多彩的汉文化。

8世纪以后，密教逐步风行全印度，佛教与印度教和民间巫术的界限已难于区分。在密教之中，既有可贵的养生术和健身法，又拥有多种形式的巫术、密咒的成分，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。系统的密教在唐代传入我国，对汉地佛教的影响不算很强烈。密教传入西藏地区后，同当地苯教相结合，形成“藏密”或“西密”。从西藏和缅甸传入云南大

理地区的密教，与当地少数民族信仰相结合，形成阿阇黎教，或称“滇密”。从我国传到日本的两支密教派系，一名“东密”，一名“台密”。12、13世纪，伊斯兰教风卷残云般地把佛教从其故土上排除，佛教流行在印度之外的广大亚洲地区。

包括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在内的三大世界宗教中，佛教的历史最久长。在亚洲各地区、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来往中，佛教发挥过不可取代的桥梁作用。中国佛教在这个广袤的文化圈中举足轻重。同时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中国佛教的演变不仅受本国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制约，也与这种域外佛教兴衰变化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。

2．汉代佛教传播

大约公元前 2世纪后期，印度佛教经由中亚细亚，沿着著名于世的“丝绸之路”辗转进入今天的新疆地区。这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开端，但当时对汉地尚无影响。

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，西域各国使臣或商贾出于政治、经济目的来华，也把他们信奉的佛教带到内地，并且很快使之在上层社会中流传。据《三国志·魏志·东夷传》注引（魏略·西戎传》，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公元前 2 年），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的《浮屠经》（即佛经），由此拉开了佛教在汉地传播的序幕。

在汉末以来的各类佛教典籍和正史野史中，对

“汉明感梦”的故事记述最多。据说，汉明帝某夜梦见一位“神人”，身有日光，飞在殿前。第二天，明帝将梦境告知朝见的群臣，通人傅毅认为此“神人”即是佛。于是，明帝遣使者前往西域，到大月氏抄回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起汉地第一座佛寺，即“白马寺”。

有关佛教初人中土的记载颇多，除去极明显的杜撰伪说，像“汉明感梦”之类包含若干史实的描述，也往往与神话交织缠绕。“汉明感梦”的故事不可能完全属实，也不能作为佛教传入中土之始，但它反映出佛教当时已在皇室贵族阶层有相当影响。在我国历史上，有记载的第一位奉佛皇室贵族，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。

据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，刘英既喜好黄老道术，又信奉佛教，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。刘英的奉佛活动主要有三项：按照佛教的要求实行“斋戒”，即遵守未出家信徒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不饮酒等基本戒条，遵守不佩带香花、不视听歌舞、过午不食等禁欲主义的生活规定；招徕包括方士在内的外籍僧侣，供其食物；把黄帝、老子和浮屠（佛）无差别地视为可祈求祐护的神灵，并行祭祀。刘英的诸种做法得到汉明帝的认可和赞许，反映出上层社会对初来佛教的一般认识和理解。

汉明帝之后约百余年，关于佛教的传播情况史籍缺载。到东汉末年，特别从汉桓帝统治时期开始，佛教在社会动荡中迅速发展起来，不仅行于宫

廷，而且走向民间。

汉桓帝刘志（147～167年）仿效楚王英的作法，在宫中将黄老和佛并行祭祀，为个人和国家求福祥。这位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，进一步把佛作为王室崇拜的对象。帝王追求永延国祚，佛也就被赋予这样的神圣功能。

汉末最著名的信佛的地方官僚是笮融。他活动于汉灵帝和汉献帝之时，早年奉佛，在投奔徐州牧陶谦后，管理广陵（江苏扬州）、下邳（江苏宿迁）和彭城（江苏徐州）的运漕，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批粮食，促进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发展。他建造的佛寺规模宏大，可以容纳3000人，铸造的铜佛像以金为饰，并且举办浴佛法会（纪念佛诞生日）。他以信佛免役为号召，招徕民户，扩大信徒队伍，并且召集民众听讲佛经。他还在大路上施舍饭食，长达数十里，就食者达万人。佛教的声势至此空前浩大。

与笮融基本同时代的另一位信佛名人是牟子。关于此人的真伪，学术界的意见分歧较大。现代多数学者认为，牟子于汉末将母避乱交趾（治所在今越南河内），撰写了《理惑论》一文。他全力排斥道教神仙辟谷之术，从伦理观上为僧人辩护，宣扬佛教基本教义，侧重佛学与儒家五经和道家《老子）的调和。像牟子这样的避乱之人，最初把佛教从北向南带到交州；同时，也有人沿海路从马来半岛把佛教输入交州。交州大约是佛教在南北两条路

线上传播的交汇地。

从西汉末到东汉末的 200 年间，佛教经历了从流行于宫廷到进入民间的社会传播路线。皇室贵族和地方官僚，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推动了佛教的流行。有知识的崇佛文人，则把佛教教理推向社会各个阶层。从佛教传播的地域看，洛阳始终是汉代佛教的中心地，由此向南，佛教逐渐传到江淮流域，以彭城、广陵、丹阳为重镇，旁及颍川、南阳、下邳、豫章、会稽，并且直达广州、交州。下面在简单介绍译经人的活动时，这些有形的传播路线会更清晰。

3. 汉代佛经翻译

汉桓帝到汉献帝时期，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，汉代佛教译籍基本完成于这 40 余年间。据《出三藏记集》，汉代译出佛典 54 部 74 卷。知名的译经人有来自安息的安世高、安玄；来自大月氏的支娄迦谶 、支曜 ；来自康居的康孟祥；来自古印度的竺佛朔。他们的译事没有朝廷的组织和支持，分散进行，主要得力于民间信徒的资助。少数汉族文人直接参与译事，充当助手，成为汉族最早的佛经翻译家。

汉代译籍兼有大小乘佛教经典，人们当时还不能区分，同视为佛所讲说。在所有的译经人中，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译籍最具影响。

安世高名清，号称“安侯”，原为安息国王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太子，后放弃王位继承权，外逃出家，于汉桓帝初年到达洛阳，学通汉语，从事译经。汉灵帝末年，他避乱南走广州，后客死会稽。传说安世高懂医道，善异术（特异功能、魔术之类），解鸟兽之言，与当时的方士有相似的本领。他活动于我国南北各地 40 年左右，前后译出经典达 34 部 40 卷，以《阴持入经》和《安般守意经》为代表译作。

安世高的译籍，多属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（十八部派之一），所传理论被概括为“禅数”之学。“禅数”与“定慧”、“止观”的含义大体相近似，“禅”指禅定，“数”指按数字顺序编排的佛教义理，如“四禅”、“五蕴”、“六识”、“七觉支”、“八正道”等等。禅数作为佛教的一种重要修行方法和理论，其最主要的特点，是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定的修习对象，按照特定程序思考，以形成宜于宗教修行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，最后达到符合佛教教义的特定认识。

根据安世高译的《安般守意经》，禅修先从数息开始，从一至十反复数气息出入，不得紊乱和增减。经过一段时间练习，进而把注意力从呼息次数转到一呼一息的气息运行上，最后再把全部意念集中到鼻头。在能够达到自我意念调控之后，按照特定程序进行思考，创造出相应的意境，最后取得所谓“制天地”、“住寿命”的功效。这种禅法的具体操作和追求目标，与当时神仙方术家的呼吸吐纳养生之术颇相似，所以很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。

安世高在译经传教过程中，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汉族信徒，主要有严佛调、南阳韩林、颍川皮业、会稽陈慧等人。其中严佛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汉籍出家人，也是有记载的汉代唯一的一位。他除了协助安译经外，还著有《沙弥十慧章句》，这是我国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。从现存的序文看，可能引用了不少佛教经典，发挥安世高的学说。

支娄迦谶是大月氏人，汉桓帝末年到达洛阳，汉灵帝时着手译经，共译出佛经 14 部 27 卷，以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首楞严三味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为主。前一部经是讲大乘般若（意为智慧）理论的，后两部以讲大乘禅法为主，理论上与般若类经典相互补充。他是把般若学传入汉地的第一人，当时虽然没有多大影响，但到了两晋，般若说的怀疑论倾向与否定权威的批判精神，同玄学相激荡和融合，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翻译佛经的过程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相融合的过程。参加助译的中土文人对佛教越陌生，担任主译的外籍译家对汉文化越隔膜，佛教译籍的中国化特色就越浓重。在翻译佛典中的某些重要名词、概念时，译者常选用最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流行词汇，这样一来，佛典虽然容易为中土人士所理解，但佛教的义理也随之有所改变。与晋代以后的佛教译籍相比较，汉代译籍多用道家术语，如“涅槃”译作“无为”，“禅定”译成“守一”，“地狱”译作“太山”，“真如”或译“本无”、或译

“自然”、或译“璞”等等。这反映了汉代佛教受道家及神仙方术影响之深。

4. 汉代佛教风貌

到东汉末年，域外佛教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，学派众多，典籍浩繁。然而，汉代来华传教的僧俗为数较少，译出的译典十分有限，人们远不能认识佛教的整体面貌和主要精神。各阶层人士理解和接受佛教，首先受到本民族传统宗教观念和思想文化的制约和支配。

西汉初年，黄老思想曾是统治阶级施政的理论基础。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它逐渐与神仙信仰、阴阳五行学说及各种方术结合，通行于汉代社会各阶层。在与儒家思想和黄老道术衔接、协调过程中，初传佛教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貌。

《理惑论》所提出的诸多观点，代表了汉代人对佛教的基本认识。据解释，“佛”是一种“谥号”，与三皇神、五帝圣没有什么区别，乃是“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绪”。这样一来，佛就具有了与儒家、道家神灵大致相同的地位。佛具有无限神通，可以分身散体，能小能大，能圆能方，并且蹈火不烧，履刃不伤。这与《庄子·齐物论》描述的“至人”基本一致。把佛视为大神，自然要像对待本土神灵一样顶礼膜拜，祈求祐护。楚王刘英、汉桓帝刘志等把黄老浮屠并祀，正反映了这种心态。佛作为人们祈求现世利益和来世幸福的信仰对象，

自佛教初传而形成，此后也没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
依佛教的观点，现实社会充满苦难，世俗情欲是引起苦难的总根源，要想达到解脱，必须割断对世俗生活的主观迷恋和实际追求。与汉代各类方士相比，佛教僧人宗教实践方面的苦行、禁欲色彩十分明显。外籍僧人倡导视富贵如粪土，视美女如骷髅，一日一食，修道生活严酷。对此不屑一顾的某些中土人士认为，沙门生活既不符合好富贵、恶贫贱的人之常情，也与孔子讲的“食不厌精”之类大异其趣。相反，信仰佛教的人士对此大加称赞。襄楷曾上书汉桓帝，讲佛教的“省欲去奢”，以此规劝帝王，使佛教的苦行、禁欲具有了教化功能。至于佛教僧侣抛弃妻子骨肉，剃除须发离家修道，与儒家伦理观念完全背道而驰，在一开始就受到激烈抨击。信奉佛教的人士则认为，这些作为恰恰是体现了最高的孝道。佛教就在这种毁誉激烈的舆论环境中寻生存、求发展。

佛教把戒杀放在戒律的首位，特别予以强调。所谓戒杀不仅是指人，而且及于昆虫蝼蚁，这在中国经典中极少见。在汉末的动乱年月中，“好生恶杀”特别能引起广大底层民众的感情共鸣。这是佛教能唤起人们支持和同情的重要方面。

汉代方士不言布施，佛教则以讲布施闻名。布施的范围十分广泛，从钱财到肉体，从物质到精神，无所不有。以财力、体力和智力使他人受益的布施活动，被视为达到个人解脱的必要环节，既是

僧人的职责，也是俗人的义务。汉代布施受到社会重视，笮融施舍饭食的规模即十分可观。在此后中国社会，布施活动成为信奉和支持佛教的重要内容。

在我国本有善恶报应的零碎说法，但没有像佛教讲因果报应、三世轮回那样系统的学说体系。自佛教传入，因果报应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为各阶层人士所接受，此后形成社会上最有影响、流传最广的一种信仰。

佛教传入中土，一方面受汉文化的熏染和修正，与儒、道等宗教观念接轨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适应中国社会，成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具有不可取代性的补充物。佛教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塑造出特有的宗教形态，开始在中国扎根和生长。

三、社会普及与般若思潮

1. 三国西晋佛教概况

三国和西晋（220～316 年）的近百年间，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，从统一又迅速陷于更严重分裂的过程。220 年，曹丕在洛阳立魏代汉，统治整个中原地带；221 年，刘备于成都建蜀，控制西南一隅；222 年，孙权在建康立吴，管辖长江以南。265 年，司马炎通过宫廷政变方式代魏建晋，至 280 年灭吴，实现全国统一。门阀地主支撑的西晋王朝统一时间不长，皇室宗亲间就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“八王之乱”（291～306 年）。内战极度损耗了王朝的武装防御力量，使它无力阻挡北方少数民族汹涌的南进势头，全国随之陷入更严重的割据混战状态。分裂、统一、再分裂的快速交替，制约着佛教在各地不平衡发展的进程。

魏都洛阳长期是北方佛教的重镇，颇有群众基础。关于魏王室与佛教的关系，佛教典籍中有引人注目的记载。据说，曹植信奉佛教，在鱼山（山东东阿县）游览时，曾听到空中传来的梵天之赞，即佛教的赞美歌。其后他仿效天乐所作的梵呗（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